

壮族大学生所用壮语语序的现状： 一项社会语言学调查*

孙 瑞 赵琪琪

[提要] 壮语语序近几十年来迅速变异并表现出向汉语语序靠拢的趋势。对 12 种壮语语序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4 种语序已发生明显变异，3 种语序发生较明显的变异，5 种语序变异程度相对较低。壮语语序变异速度加快是因为壮—汉双语接触的方式、深度和范围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大体上，可从语言接触和语言习得等角度对壮语语序的变异作出系统解释。壮语语序的改变会导致壮语语言系统的深刻变革。

[关键词] 壮语语序 变异 语言接触 语言习得

一 引 言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原移民进入广西，至迟不晚于秦代；大规模涌入发生在宋明之后；到了清代，移民的规模愈加庞大，广泛分布于桂中、桂东及周边的各个地区（苏建灵 1991；郑维宽 2015）。壮、汉两族人民长期以来不断接触，壮语也在与汉语的接触中持续发生变化。但直至 1949 年之前，这种变化的进程都是比较缓慢的；1949 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迅速提升和普通话推广工作的持续开展，越来越多的壮族人学会了普通话，壮语的语言功能和语言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远超从前的变化（陈章太 2002）。

不少学者注意到壮语语序所发生的变化。覃晓航（1988）、梁敏（1989）、季永兴（1993）、黄行（1996）、李云兵（2008）、吴福祥（2009b、2009c）、韩林林（2011）、程博（2012）、赵晶（2012）、郭鑫（2012）等研究了壮语定中结构语序的变异；李云兵（2008）、吴福祥（2008、2009a）、梁敢（2009）等则讨论了壮语部分状中结构和动宾补结构语序的变异。这些研究大多把壮语语序变异看作是一种结果，从语言接触或语言对比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把壮语语序变异看作是一个过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社会语言学视野下进行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壮语语序变异目前进行到何种程度？未来的趋势如何？其快速变异的诱因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 本文是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语言文字研究专项课题“广西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认同研究（2015ZYG017）”的阶段成果。论文曾在“《民族语文》创刊 40 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北京 2019.10.12-13）上宣读，与会学者提出了宝贵意见。本文写作过程中，南宁市武鸣区民族中学黄锦艳老师帮助翻译并核对了壮语语料，覃凤余教授、覃东生博士以及匿名评审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二 调查方法

(一)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壮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具体实施时，以广西民族大学和百色学院少数民族预科班^①的学生为代表进行调查。选择预科班学生进行调查的原因有二：第一，预科班中的壮族学生比较多，便于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第二，这些壮族学生来自广西的不同地区，有广泛的代表性，其语言使用大体能够反映壮族大学生语言使用的现状和壮语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 测试项目的选择

壮语方言土语众多，可分为南部壮语和北部壮语两大方言区。南部壮语和北部壮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音上，语法上只有某些虚词和附加成分略有不同，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孙宏开等 2007:1110）。所以，我们在确定语法项目时，并不区分南、北壮语。

语序指“特定语法结构中有意义成分的排列次序”（吴福祥 2012），是语言演变研究的重要参项。壮语与汉语都将语序当作重要的语法手段（梁敏、张均如 1996:839-842；韦景云、覃晓航 2006:3）。壮语是典型的 SVO 型语言（刘丹青 2002），其固有语序^②严格遵守 SVO 型语言的语序蕴含共性；而汉语则是非典型的 SVO 型语言，许多结构违反 SVO 型语言的语序共性。也就是说，壮语与汉语的固有语序有较大差异。根据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倪大白 1990；张元生、覃晓航 1993；孙宏开等 2007），我们把壮语与汉语语序存在明显差异的结构归为 3 类^③：定中结构、状中结构和动宾补结构。下面分别进行介绍^④。

1. 定中结构

(1) 单词作定语

壮语中，常充当定语的单个词语主要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指示词^⑤和代词等几种词类。它们作定语时，壮语的固有语序是中心语在前、定语在后。其中，名词作定语时，最常见的情形是名词用作领属定语，本文就以此种类型为代表讨论名词作定语的情况；指示词作定语时，中心语可以是时间名词，也可以是量词等。

①名词作定语表领属，例如：yan²（屋）po⁶luŋ²（伯父）“伯父的屋子”。

②动词作定语，例如：hau⁴（饭）naŋ³（蒸）“蒸的饭”。

③形容词作定语，例如：pu⁶（衣服）heŋ³（黄）“黄色的衣服”。

④指示词作定语修饰时间名词，例如：pi¹（年）nai⁴（这）“今年”；指示词作定语修饰量词，例如：pau⁴（位）han⁴（那）“那位”。

⑤人称代词作定语表领属，例如：pu⁶（衣服）fan²（他）“他的衣服”。

^① 预科班的学生均为广西境内应届少数民族高中毕业生，他们完成高中学业后在预科班进行为期一年的预科学习，再进入广西境内各高校学习专业课程。截至 2019 年 9 月，这些学生已完成预科班的学习，进入高校学习大学课程。

^② “固有语序”指在没有外部语言接触的影响下，一种语言或方言自主形成的语序。

^③ 壮语中语序与汉语不同的结构还有其他类型，但最主要的是这 3 类。

^④ 需要说明的是，为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我们在文中列出的类型均为现有文献中谈到过的类型。

^⑤ 壮语的 nai⁴“这”、han⁴“那”大多不能单用，只有指示功能而没有称代功能，因此我们将之单独列为一类。

(2) 短语作定语

A. 量词短语作定语

“量词短语”包括由数词加量词组成的数量短语和由数量短语加指示词组成的数量指短语。数量短语修饰名词中心语的语序与数词有关：当数词为 deu^1 “一”时，固有语序是“量词+名词+ deu^1 ”；当数词不是 deu^1 时，语序与汉语相同，均为“数词+量词+名词”^①。数量指短语修饰名词中心语的固有语序是“(数词+量词+名词+指示词”，当数词是 deu^1 时， deu^1 一般不出现，此时的数量指短语表现为量指短语。

①数量短语作定语，例如： pau^4 (个) vun^2 (人) deu^1 (一) “一个人”； $\theta a:m^1$ (三) tu^2 (只) yok^8 (鸟) “三只鸟”。

②量指短语作定语，例如： pau^4 (个) vun^2 (人) nai^4 (这) “这个人”。

③数量指短语作定语，例如： $\theta a:m^1$ (三) pau^4 (个) vun^2 (人) han^4 (那) “那三个人”。

B. 关系从句作定语

壮语中，关系从句作定语时一般修饰名词性成分，其固有语序是“名词+关系从句”。

例如： vun^2 (人) $khap^8$ (捉) pja^1 (鱼) “捉鱼的人”； ki^3 (些) tu^6 (豆) yau^2 (咱们) dam^1 (种) han^4 (那) “咱们种的那些豆”。

2. 状中结构

本文仅讨论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的情况。壮语中，该类结构的固有语序是“动词+状语”。

例如： $ku^6h\theta\eta^1$ (工作) jou^5 (在) $pu^2ki\eta^6$ (北京) “在北京工作”。

3. 动宾补结构

本文仅讨论补语为结果补语的情况。壮语中，该类结构的固有语序是“动词+宾语+结果补语”。例如： mop^8 (打) tu^2 (只) nou^1 (老鼠) deu^1 (一) tai^1 (死) “打死一只老鼠”； θak^8 (洗) pu^6 (衣服) $wa^5\theta eu^5$ (干净) “洗干净衣服”。

状中结构和动宾补结构都包含很多类型，但已有研究初步表明，“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和“动+宾+结果补语”是壮语中明确发生语序变异的两种类型，所以我们以其为代表，对状中结构和动宾补结构语序的变异状态进行考察。

基于前期考察，我们最终确定了12个语序调查项目，分别是：名词作领属定语、动词作定语、形容词作定语、指示词作时间名词定语、指示词作量词定语、人称代词作领属定语、数量短语作定语、量指短语作定语、数量指短语作定语、关系从句作定语、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以及“动+宾+结果补语”（下文简称为“动宾补”）结构。

(三) 问卷结构

调查问卷由背景调查和句法判断测试(GJT, Grammaticality Judgment Task)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壮一汉双语语言能力；第二部分测试调查对象对测试项两种语序的接受度。第二部分共12个测试项，即前文确定的语序调查项目；每个测试项包含2个测试题，一题测试变异语序的接受度，另一题测试固有语序的接受度，共24题。另外，问卷还设计了6个干扰题，故第二部分共30题。每一题均有5个选项：“完全不接受”（记“1”分）、“基本不接受”（记“2”分）、“基本接受”（记“3”分）、“完全接受”（记“4”分）和

^① 程博(2012)认为，壮侬语数量名结构的固有语序是“名—数—量”，壮语数词不为 deu^1 时的语序“数—量—名”是固有语序变异的结果。

“我不知道”（标记为“X”^①）。

（四）调查的实施

在广西民族大学和百色学院少数民族预科班辅导员的帮助下，问卷调查于 2019 年 5 月正式实施。本次调查共回收壮族学生填写的问卷 1991 份。排除非壮—汉双语学生填写的问卷^②和其他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1516 份。所有参加调查的壮族学生都曾在壮—汉双语环境中生活，但由于他们在生活中接触壮语的时间和机会不同，所以壮语水平也明显不同。

三 调查结果分析

（一）壮族大学生壮—汉双语水平分析

我们通过让调查对象进行自我评价的方式来确定其语言水平：“1 分”表示完全无法听/说这种语言，“2 分”表示听/说这种语言有很大困难，“3 分”表示听/说这种语言有一些困难，“4 分”表示听/说这种语言完全没有困难。将调查对象“听”的得分与“说”的得分相加，便得到该语言听说水平的总得分。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壮族大学生壮—汉双语听说水平

得分	壮语		汉语	
	人数(人)	百分比(%)	人数(人)	百分比(%)
3分	100	6.6	4	0.3
4分	161	10.6	24	1.6
5分	156	10.3	26	1.7
6分	235	15.5	73	4.8
7分	172	11.3	69	4.5
8分	692	45.7	1320	87.1
合计	1516	100.0	1516	100.0

统计发现，自报听说汉语完全没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得分为 8 分）占全部调查对象的 87.1%，而自报听说壮语完全没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得分为 8 分）比例仅为 45.7%。这表明，调查对象的汉语水平可能整体上高于壮语水平。

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又计算了调查对象的壮—汉双语平衡程度，计算方法为：用壮语水平得分减去汉语水平得分，若得分为负数，表示调查对象的壮语水平低于汉语水平，记为“汉—壮型”；若得分为正数，表示该调查对象的壮语水平高于汉语水平，记为“壮—汉型”；若得分为“0”，则表示该调查对象两种语言水平大致相同，记为“平衡型”^③。统计结果见表 2：

^① 设置该选项是为了确保选项能够反映调查对象的真实想法。统计时，选择“我不知道”选项的，视为缺失项。

^② 之所以排除非壮—汉双语学生的问卷，是因为其均为汉语单语人，无法通过调查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了解壮语的面貌。

^③ 对壮—汉双语人进行分类借鉴王远新（2000）的方法。

表2 壮族大学生壮—汉双语平衡程度情况

双语人类型	人数(人)	百分比(%)
壮—汉型	43	2.8
平衡型	759	50.1
汉—壮型	714	47.1
合计	1516	100.0

从表2可知,平衡型(50.1%)和汉—壮型(47.1%)双语人总占比达97.2%,而壮—汉型仅占2.8%。这说明仅极小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壮语水平高于汉语水平,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壮语水平低于汉语水平或与汉语水平相近。

(二) 壮族大学生壮语语序变异情况

我们用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衡量壮语语序变异程度,进而确定高变异项和低变异项:如果调查对象对某一测试项变异语序的接受度显著高于对固有语序的接受度($p < 0.05$),那么该测试项便被确定为高变异项;反之,如果调查对象对固有语序的接受度显著高于对变异语序的接受度($p < 0.05$),该测试项则被确定为低变异项。

为了保证研究有充分的说服力,我们基于两种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全部样本数据(以下称为“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壮语水平较高(指得分在6分以上)的学生的数据(以下称为“高分样本数据”)挑出来单独进行分析^①。分析工具为统计软件SPSS 25.0。

1. 对全样本数据的分析

表3 变异语序和固有语序接受度配对样本T检验(全样本)

序号	测试项	均值差 ^②	t	df	Sig(双侧)
1	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	.8508	29.336	1515	0.000
2	动词作定语	.4026	10.939	1515	0.000
3	关系从句作定语	.4128	13.420	1515	0.000
4	数量短语作定语	.2118	6.059	1515	0.000
5	量指短语作定语	.1363	3.456	1515	0.001
6	名词作领属定语	-.0158	-.446	1515	0.656
7	数量指短语作定语	-.0313	-.849	1515	0.396
8	人称代词作领属定语	-.1385	-3.678	1515	0.001
9	指示词作量词定语	-.2319	-5.758	1515	0.000
10	动宾补结构	-.3025	-9.574	1515	0.000
11	指示词作时间名词定语	-.3279	-8.100	1515	0.000
12	形容词作定语	-.4317	-12.378	1515	0.000

^① 在《民族语文》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在我们的样本中,有部分调查对象的壮语水平较低,这部分数据可能影响最后结果的可信度。为此,我们将壮语水平较低人员的数据剔除,然后再进行验证性分析。

^② “均值差”指某一测试项变异语序接受度与固有语序接受度的差值。

对全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变异语序接受度高于固有语序的测试项有 5 个(即表 3 中 1—5 项)：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动词作定语、关系从句作定语、数量短语作定语和量指短语作定语。数据显示，调查对象对这 5 个测试项变异语序的接受度已经明显高于对其固有语序的接受度 ($p < 0.05$)。这说明，这 5 个测试项的语序在调查对象的壮语系统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属于高变异项。

固有语序接受度高于变异语序的测试项有 7 个(即表 3 中 6—12 项)：人称代词作领属定语、指示词作量词定语、动宾补结构、指示词作时间名词定语和形容词作定语等 5 个测试项(即表 3 中 8—12 项)固有语序的接受度显著高于变异语序的接受度 ($p < 0.05$)，属于低变异项；而名词作领属定语和数量指短语作定语(即表 3 中 6—7 项)固有语序接受度虽然高于变异语序，但其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p > 0.05$)，说明这 2 个测试项固有语序和变异语序的接受度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

2. 对高分样本数据的分析

表 4 变异语序和固有语序接受度配对样本 T 检验 (高分样本)

序号	测试项	均值差	t	df	Sig(双侧)
1	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	.9199	25.571	1097	0.000
2	动词作定语	.3158	6.750	1097	0.000
3	关系从句作定语	.4140	10.712	1097	0.000
4	数量短语作定语	.1198	2.748	1097	0.006
5	量指短语作定语	-.0470	-.975	1097	0.330
6	名词作领属定语	-.1232	-2.781	1097	0.006
7	数量指短语作定语	-.2365	-5.261	1097	0.000
8	人称代词作领属定语	-.3240	-7.051	1097	0.000
9	指示词作量词定语	-.4592	-9.375	1097	0.000
10	动宾补结构	-.4342	-10.972	1097	0.000
11	指示词作时间名词定语	-.5045	-10.093	1097	0.000
12	形容词作定语	-.6019	-13.926	1097	0.000

对高分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将表 4 与表 3 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高分样本和全样本所体现出来的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无论采用哪个样本进行分析，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动词作定语、关系从句作定语以及数量短语作定语等几个测试项变异语序的接受度都显著高于固有语序 ($p < 0.05$)，也就是说，它们的语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人称代词作领属定语、指示词作量词定语、动宾补结构、指示词作时间名词定语以及形容词作定语等几个测试项变异语序的接受度则明显低于固有语序 ($p < 0.05$)，也就是说，它们的语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情况出现变化的有 3 个测试项：量指短语作定语、名词作领属定语和数量指短语作定语。在全样本中，量指短语作定语变异语序的接受度显著高于固有语序的接受度(均值差为正数， $p < 0.05$)，名词作领属定语和数量指短语作定语变异语序的接受度略低于固有语序(均值差为负数， $p > 0.05$)；而在高分样本中，量指短语作定语变异语序的接受度却略低于固有语序

(均值差为负数, $p > 0.05$), 名词作领属定语和数量指短语作定语变异语序的接受度都显著低于变异语序(均值差为负数, $p_s < 0.05$)。

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 上述3个测试项在全样本和高分样本中的差异并不是本质差异, 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虽然量指短语作定语变异语序的接受度在全样本中显著高于固有语序, 在高分样本中低于固有语序, 但在高分样本中, 固有语序与变异语序接受度的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所以全样本和高分样本在该项目上的差异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大; 名词作领属定语和数量指短语作定语无论在全样本中还是在高分样本中, 变异语序的接受度都低于固有语序, 只不过在高分样本中比较显著($p_s < 0.05$), 而在全样本中不够显著($p_s > 0.05$)罢了, 所以它们之间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上述分析暗示了一个规律: 变异语序在全样本中的接受度往往略高于在高分样本中的接受度; 固有语序则相反。事实上, 这一规律在其他测试项中基本也都存在。这提示我们, 调查对象的壮语水平可能影响其对变异语序的接受度。

综合各测试项在全样本和高分样本中的表现, 可以对本文考察的12个测试项语序的变异程度进行排序, 由高到低顺序如下:

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动词作定语、关系从句作定语以及数量短语作定语 > 量指短语作定语 > 名词作领属定语和数量指短语作定语 > 人称代词作领属定语、指示词作量词定语、动宾补结构、指示词作时间名词定语和形容词作定语

该序列表明, 壮语的语序变异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 不同结构的变异速度不同。

(三) 壮语水平与壮语语序变异之间的关系

为了考察壮语语序变异是否受壮语水平的影响, 我们对调查对象的壮语水平和测试项变异语序的接受度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壮语水平与变异语序接受度的相关性检验^①

序号	测试项	变异语序	
		Pearson 相关系数	Sig (双侧)
1	形容词作定语	-.148**	0.000
2	指示词作时间名词定语	-.153**	0.000
3	指示词作量词定语	-.192**	0.000
4	人称代词作领属定语	-.155**	0.000
5	名词作领属定语	-.100**	0.000
6	动词作定语	-.067**	0.009
7	量指短语作定语	-.165**	0.000
8	数量指短语作定语	-.210**	0.000
9	动宾补结构	-.197**	0.000
10	关系从句作定语	-.003	0.900
11	数量短语作定语	-.039	0.133
12	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	.067**	0.009

^① 考虑到高分组与全样本的总体趋势一致, 同时高分组学生壮语水平差别不是太大, 所以我们仅以全样本数据进行计算。

表 5 显示，在 12 个语言测试项中，有 11 项（表 5 中 1—11 项）变异语序的接受度与调查对象的壮语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负数）。也就是说，对于这 11 个语言测试项来说，调查对象壮语水平越高，变异语序接受度越低；反之，壮语水平越低，变异语序接受度则越高。这种趋势在 1—9 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变异语序接受度与调查对象壮语水平之间的负相关性达到了显著水平（ $p < 0.05$ ）。

第 12 个测试项即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的情况比较特殊。该测试项变异语序接受度与调查对象壮语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调查对象的壮语水平越高，该测试项变异语序的接受度也越高。出现这种例外的原因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推测可能是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语序变异的时间比较早，壮族大学生小时候接触的主要是其变异语序，固有语序反而是在他们壮语水平不断提升之后才接触到的，因此才出现了壮语水平与变异语序接受度呈正相关的局面。我们之所以这样猜测，有两点依据。第一，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是 12 个测试项中变异语序接受度最高的结构（其变异语序接受度达 88%^①，比排名第二的关系从句作定语的 83% 高出不少），也是固有语序接受度最低的结构（仅为 67%），同时还是变异语序和固有语序均值差最大的结构（均值差为 0.8508，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关系从句作定语的 0.4128），这说明该测试项语序变异度很高，而如此高的变异度则说明其语序可能很早就开始变异了。第二，韦庆稳、覃国生（1980:52）提到，由介词 *jou*⁵ “在、从” 构成的介词结构可以放在动词的前面做状语，例如 *jou*⁵（在）*ɣam*²（家）*naŋ*⁶（坐）“在家坐着”；更有甚者，李方桂（2005:42, 117）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就记录了这样的例子：*ju*⁵⁵*kuk*⁵⁵*mai*^{ʔ31}*nom*³¹*ɬe*³³（在脚树睡着）；*ju*⁵⁵*ɬəm*³¹*pau*^{ʔ31}（在家守）。这说明，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的语序至少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发生了变异。本文的调查对象都是出生于 2000 年前后的青年，显然，他们一出生就接触到了处所介词短语前置于动词作状语的结构。

整体而言，第 12 个测试项的特殊情况并不影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壮语水平与变异语序接受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壮语水平越高，变异语序接受度越低；壮语水平越低，变异语序接受度越高。

四 讨 论

（一）壮语语序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赵晶（2012）曾指出，“壮语的名词短语语序正逐渐趋同于汉语”。我们的研究不仅验证了其结论，而且证实还有更多的壮语语序正逐步向汉语语序靠拢。这事实上也是当前壮语语序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除此之外，当前壮语语序的发展至少还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变异速度特别快。语法的演变速度通常比较缓慢，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壮语语序缓慢演变的局面被彻底改变了。笔者一位四十来岁的壮族同事曾说，现在她每次回到家乡，听到村子里孩子们说的壮语，都不由感慨：这些孩子说的是什么呀？跟自己小时候说的壮语完全不同！我们认为，这并非孤例，而是普遍现象。本文所调查到的大量的、深度的语序变异现象是对这一现象的再次佐证。如此大的变化发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速度不可谓不快。

^① 接受度的计算办法是用测试项变异语序或固有语序的得分除以总分。比如，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变异语序的得分是 5349，总分是 6064，因此接受度约为 88%。

第二, 壮语不同结构语序变异的速度不同。前文的调查结果已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 但到目前为止, 还很少有学者深入讨论其原因。我们认为, 壮语语序变异的速度至少受以下 3 个因素的影响:

①结构结合的紧密度。通常情况下, 结合紧密度低的结构更容易发生语序变异, 紧密度高的则不容易变异。短语与短语结合的紧密度往往低于词语与词语结合的紧密度, 更低于语素与语素结合的紧密度。我们的调查显示, 由短语充当定语或状语的结构(如数量短语作定语和关系从句作定语)的语序变异度往往较高, 而由词语充当定语的结构(如形容词作定语、名词作领属定语)以及已经开始词汇化的结构(如 pi¹nai⁴ “今年”等)的语序变异度则往往相对较低。

②结构的语言类型学属性。据语言类型学的研究, “被领属成分+领属者(N+G)”语序与 SVO 型语言高度和谐, 而“名词+形容词定语(N+A)”语序则是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倾向(参看 Greenberg 1963)。形容词作定语、名词作领属定语以及人称代词作领属定语的语序均符合语言类型学共性, 因此不太容易发生变异。

③结构的习得难度。语言使用情况反映语言习得的结果, 壮族大学生对壮语语序的接受度反映了其壮语语序的习得情况。语言习得研究表明, 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结构往往更容易被习得(蒋平、蔡慧 2009)。以处所介词短语作状语为例, 其反映的事实往往是先有处所, 后有动作行为, 所以, PPV 结构^①与人类的逻辑认知方式更加契合, 也因此, 变异语序“jou⁵na:m²niŋ²(在南宁) tok⁸sau¹(读书)”接受度很容易就高于固有语序“tok⁸sau¹(读书) jou⁵na:m²niŋ²(在南宁)”。动宾补结构的情况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 如“洗干净衣服”反映的事实应该是先“洗衣服”, 然后才“(衣服)干净”, 所以, “洗衣服干净”也许才是更契合人类认知逻辑的。也因此, 固有语序“θak⁸(洗) pu⁶wa⁵(衣服) θeu⁵(干净)”比变异语序“θak⁸(洗) θeu⁵(干净) pu⁶wa⁵(衣服)”接受度更高。此外, 语言习得理论还认为, 使用频率是影响语言习得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 使用频率高的结构往往更容易习得, 使用频率低的结构则相反(罗瑜 2005 等)。一般来说, 形容词作定语的使用频率要高于动词作定语, 也高于关系从句作定语, 所以, 壮族大学生习得形容词作定语的情况要好于动词作定语和关系从句作定语。因此, 壮语中形容词作定语的固有语序保存得更好; 另两种结构固有语序的保存情况则要差很多, 其变异语序相应地也就更容易被接受。

(二) 壮语语序迅速变异的原因

壮、汉语接触古已有之, 为什么在之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壮语语序变化缓慢, 而最近几十年却突然加速了呢? 我们从语言接触和语言习得这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1949 年以前, 虽然壮、汉语也有接触, 但这种接触是小范围、浅层次的, 未能形成特别大规模的壮—汉双语人群体。壮族仍主要以壮语为主要交际工具进行族内交际; 即便在一些民族杂居的地区, 壮语也可能是强势语言。因此, 绝大多数壮族都能够发展出成熟的壮语语言能力, 其壮语不会因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而轻易发生系统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部分经常与汉族接触的壮族的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异, 也很难影响到整个壮族群体, 自然也就很难对壮语语言系统产生根本性影响, 壮语语言系统也就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1949 年以后, 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 汉、壮两族

^① “PP”指介词短语, “V”指动词性成分。

人民交往的密切程度已非昔日可比。改革开放后，广西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汉语进入到壮族民众生活的各个角落。2020年，广西普通话普及率达85.6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96个百分点，位居西部地区首位^①。事实上，现在在广西已经很难找到完全不懂普通话的青少年和儿童。换句话说，现在大部分壮族人口都成了双语人。汉语和壮语这两种语言在壮族群体内深度接触，因接触导致的变异具有普遍性，也因此，这些变异很容易被保留下来。

另一方面，与1949年前绝大部分壮族到成年后才接触汉语不同，现在的壮族大部分是在婴幼儿或者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汉语。具体可细分为3种情况：①出生后生活在壮—汉双语环境中，同时习得两种语言；②出生后主要生活在汉语环境中，首先习得汉语，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在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掌握一些壮语；③出生后主要生活在壮语环境中，首先习得壮语，同时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逐步接触汉语，后来又在学校系统学习汉语。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壮族孩子都能在语言学习的关键期^②就深度接触汉语。这就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壮族孩子基本上都能发展出良好的汉语语言能力，二是其壮语语言系统在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时候就受到汉语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些孩子的壮语语言系统便很容易因受到汉语影响而发生变异。

（三）壮语语序变异的影响与启示

从类型学上看，壮语是典型的SVO型语言，而现代汉语是非典型的SVO型语言。在与汉语的接触中，壮语的语言类型正在发生变化：从典型SVO型语言向非典型SVO型语言过渡。语言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当语言中某个子系统发生变化时，其他子系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壮语语序的变异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一定伴随着其他子系统的同时变化。就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壮语语言系统（包括壮语语序）的变异还没有最终完成；事实上，它可能正处于最活跃的变动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续的影响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古代汉语的语序与现代汉语存在一些差异。比如，上古汉语的处所介词短语大多位于动词之后，而现代汉语则大多位于动词之前；先秦汉语有宾语前置、谓语前置和定语后置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消失；中古汉语的动宾补结构与动补宾结构并行使用，后来却一致向动补宾形式归并。这些演变是如何发生的？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学界有过很多讨论，但一直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本文讨论的虽不是汉语语序演变问题，但可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五 结 语

调查发现，壮语很多结构的语序已经发生变异，而这些变异只是壮语语言系统变化的一部分。及时掌握壮语语言系统变化的最新动态，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语言学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本体研究价值，因此值得充分重视。

本文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出于调查方便的考虑，仅以就读于少数民族预科班的壮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这些青年学生代表了壮族人民的发展方向，但与普通群众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汉语水平都要更高一些；虽然我们也曾专门把壮语水平较低的样本去掉进行验证性分析，但依然不能完全消除样本代表性不足所带来的缺憾。今后，我们将以其他壮族群体为调

^① 参见 <http://www.gxzf.gov.cn/gggs/t10036753.shtml>。

^② 通常认为，12岁以前为人类学习语言的关键期。

查对象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性研究；同时，鉴于问卷调查本身有其局限性，所以我们将增加访谈环节以弥补相关不足。此外，本文调查的12个测试项只是语序发生变异的壮语语言结构中的一部分，今后还应对其他结构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陈章太. 2002. 《略论我国新时期的语言变异》，《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2] 程博. 2012. 《壮侗语数量名结构语序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 [3] 郭鑫. 2012. 《汉壮语接触视角下的武鸣壮语语法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 韩林林. 2011. 《壮汉名词性短语语序类型对比》，《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
- [5] 黄行. 1996.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民族语文》第1期。
- [6] 季永兴. 1993. 《壮汉代词数词量词名词结构形式比较分析》，《民族语文》第4期。
- [7] 蒋平、蔡慧. 2009. 《中国学生英语关系从句的习得顺序及其认知启示》，《外语教学》第3期。
- [8] 李方桂. 2005. 《李方桂全集3：龙州土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9] 李云兵. 2008. 《语言接触对南方一些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民族语文》第5期。
- [10] 梁敢. 2009. 《侗台语形容词短语语序类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 [11] 梁敏. 1989. 《壮侗诸语言表示领属关系的方式及其演变过程》，《民族语文》第3期。
- [12] 梁敏、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3] 刘丹青. 2002. 《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民族语文》第5期。
- [14] 罗瑜. 2005. 《频率效应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重庆大学学报》第1期。
- [15] 倪大白. 1990. 《侗台语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16] 覃晓航. 1988. 《从汉语量词的发展看壮侗语“数、量、名结构”的词序变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
- [17] 苏建灵. 1991. 《明、清时期汉族人口向壮族地区的迁移》，《广西民族研究》第21期。
- [18]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 2007. 《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 王远新. 2000. 《论我国民族杂居区的语言使用特点》，《民族语文》第2期。
- [20] 韦景云、覃晓航. 2006. 《壮语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1] 韦庆稳、覃国生. 1980. 《壮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2] 吴福祥. 2008. 《南方民族语言处所介词短语位置的演变和变异》，《民族语文》第6期。
- [23] 吴福祥. 2009a. 《南方民族语言动宾补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南开语言学刊》第2期。
- [24] 吴福祥. 2009b. 《南方民族语言关系小句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语言研究》第3期。
- [25] 吴福祥. 2009c. 《南方民族语言领属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东方语言学》（第六辑）第1-2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6] 吴福祥. 2012. 《语序选择与语序创新——汉语语序演变的观察和断想》，《中国语文》第4期。
- [27] 张元生、覃晓航. 1993. 《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28] 赵晶. 2012. 《壮语名词短语的语序演变》，《语言研究》第3期。
- [29] 郑维宽. 2015. 《论宋明时期广西的外来移民及其影响》，《广西地方志》第3期。
- [30]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Joseph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pp: 73-113. London: MIT Press.

Current Word Orders in Zhuang as Spoken by Zhuang University Students: A Sociolinguistic Survey

SUN Rui and ZHAO Qiqi

[Abstract]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 word orders in the Zhuang language have seen a rapid change and shown a tendency toward those in Chinese.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on the word orders of twelve constructions in Zhuang show obvious variations in four of them, relatively obvious variations in three of them, and a relatively low degree of variation in the remaining five of them. The acceleration of word order variation in Zhuang is caused by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mode, depth and scope of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Zhuang and Chinese. In general,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can be made on Zhuang word order variations in term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hifts in Zhuang word orders will induc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linguistic system of Zhuang.

[Keywords] word order in Zhuang variation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acquisition

(通信地址: 孙 瑞 530004 南宁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赵琪琪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召开系列学术会议

2021年9月以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连续召开重要学术会议,发挥学术平台引领作用。

2021年9月25-26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在京联合主办“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4次全国学术讨论会”,5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20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王延中、王丽萍、王锋等领导同志及孙宏开先生作开幕式致辞。戴庆厦、黄行、曲木铁西、江荻、李锦芳、范俊军、李大勤、吕嵩崧等知名学者作主旨报告,160位学者作学术专题报告。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党委书记赵天晓出席闭幕式并讲话,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对进一步做好学会工作提出了要求。

学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分别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2021年9月18-19日,汉藏语言文化专业委员会在聊城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和学术研讨会;10月23日,描写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召开2021年年会和学术研讨会;11月6-7日,语言类型学专业委员会在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召开第四届年会和学术研讨会。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